

16-9

鳳台文史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台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八月

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前县是山东省原寿张县的一部分，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影响到这里，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属于冀鲁豫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争取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即从县城南孙口强渡黄河，可以说文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做好这些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工作，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台前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工作，是从一九八二年建立第一届政协以后开始的。在县委的领导下，几年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一九八三年出版了《文史花絮》小报五期，一九八五年，该小报改名为《凤台沧桑》出版了两期，以后由于经费困难，小报停刊。一九八七年第三届政协会议决定自己动手，油印出版《凤台文史》刊本，不定期刊印。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现在第一期和大家见面了。在征集文史资料中，我县有关部门以及曾经战斗、工作在这个地方的老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并恳请他们以后继续给予支持。

刘华亭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前 言

目 录

先君张公瑞董传略.....	张济成 (1)
张瑞董先生轶事.....	赵铭泉 遗稿 (5)
铮铮铁骨王明双.....	赵铭泉 遗稿 (5)
刘登久先生简历.....	刘道伶 (6)
抗日战争回忆录.....	赵四祥 遗稿 (8)
刘、邓将军驻我县.....	岳彩真 (22)
寿张县历史沿革.....	郭德纯 (24)
玉皇岭遗址.....	梁衍士 (25)
我县粮食计量单位之今昔.....	葛文福 (26)
清代诗三首.....	寿张县志 (27)
近代诗二首.....	张之、崔子平 (28)
稿约.....	(29)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30)
封面题字.....	梁衍士

先君张公瑞萱传略

张济成

先父张瑞萱，原名张金兰（1880——1928），世居本县城南曹岭村。幼年时代跟随祖父从事农业。因家贫读不起书。族中富裕子弟皆往外村私塾上学，先父每于农闲伴同伊等入塾听讲。久之，无论讲解、背诵、书写，皆娴熟流畅，得到老师赏识。虽不交束修，亦准其就学。于是先父更加发愤勤学，刻苦习读。当时家中人为了节省灯油，往往入夜即睡。先父便借邻家灯光诵读，孜孜苦学，夜深始归。当时到外村私塾读书，路途较远，须带饭食。因家境贫穷，仅带几个干粮，聊以充饥。有时诵读不肯释手，常常忘记吃饭。如此专心致志，年复一年，县试中取，准备参加省试。家乡距省会三百余里，需乘黄河船只前往，需要一些盘缠，因家贫一时筹措不出，只得拿了家中两只公鸡以及随身需用物品，动身前往。家乡习俗，船只在起碇前要杀鸡祭河神，祈祷一路顺风。先父将两只公鸡送给船主，便得免费搭船。至省城后，果然中榜，到法政高等学堂肄业。经过数年刻苦攻读，终以优等成绩毕业。其时正值满清末年。

满清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中英、中法、中日战争，以至八国联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吹响了民主主义革命号角。一时各省有志之士莫不踊跃参加。先父就在那时参加了同盟会。首先剪了辫子以示决心，冒险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受到清廷的镇压、缉捕，到处流亡，曾在曲水亭下沟道内躲藏三日。后来推着小车，满载革命书籍，走遍数十县宣传革命。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辛亥革命终告成功。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一九一三年先父当选为首屆国会议员。

时全家随先父迁居北京，余仅数岁，犹忆到达北京车站，打着纸

灯笼。坐着老式马车，寓居于北京茄子胡同寓所。但先父从事国会政治生活不久，袁世凯窃据革命果实，阴谋推翻民国，恢复帝制，倒蒋洪宪。当时国会竭力反对，袁世凯动用武力，对国会中活跃议员逮捕迫害。先父事前得到消息，由北京水门逃走，经天津、上海、香港、海防而至云南。参与唐继尧、蔡松坡组织靖国联军，积极从事倒袁运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师，出兵四川，北伐讨袁。时各省响应，袁世凯闻讯暴卒而死，这就是历史上的“云南起义”。后来上海某影片公司专程前往云南，为了珍视和纪念这一历史伟绩，曾请真实人物重演真实历史，定名《洪宪之战》。唐继尧、张瑞贵等均上银幕。一九三一年，余因事路经青岛曾看此片。

袁世凯暴死之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割据自雄，置民间疾苦于不顾，无视约法宪法，无视国会法统。先父目睹时艰，毅然北上，先至上海邀请国会同仁奔赴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孙中山先生以广州为革命根据地，先组织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后又任非常总统。欢迎国会议员共同树起护法大旗。中山先生聘请先父为顾问，协助护法运动。当时国会主要任务是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致力于宪法起草工作。先父为宪法起草委员之一，专心拟制，费时两载，民国宪法初具轮廓。其间，南北政府形成对立，一度倡议南北议和。由南北政府各派代表议和于上海。先父为南方代表之一，与唐绍仪同至上海，与北洋政府代表对话商讨。均因双方立场不同，争执至大，未获结果。先父在护法这一阶段，一面从事政治工作，一面挤出时间努力学习。置了大量经史子集，各国政治论著以及碑帖字画。一字一句，朱笔圈阅，写出笔记。

不久，南方政府有了变动，改为七总裁制。云南唐继尧为七总裁之一，国会推选先父送总裁证书至云南，促唐就職。至此先父二次入滇。与唐继尧公私关系逐渐密切。先父回广东后，适逢唐继尧被其部属顾品珍、金汉鼎等驱逐离滇，出走香港。唐约先父至港密议回滇计

~2~

划。路经广西十万大山，当时报纸纷纷谣传：“唐继尧、张瑞贵等在广西山中被匪杀害”。时我全家寓居济南，见到报纸消息，莫不痛哭流涕。幸而半月之内，接到先父来信，告知已顺利攻克昆明。完满回滇计划。不过其间确实经历了惊险过程。例如在广西十万大山中先父确实掉队，在深山大泽中夜行百余里漆黑无路，全靠萤火虫照明赶上军部。先父还曾谣传英因在此。回滇后，唐继尧请先父任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司法司长、联治筹划处处长等职。意欲借重先父法治策略，规靖西南，再图大举。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复任总统，法统重光，国会重开于北京。先父应招北上，由滇至京。并代表滇唐至各省进行了观察游说。时间未及两载，终以江浙直奉之战，箭在弦上，战机即发，时局难以挽转，因而重新返滇，回任原职。

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先父政暇之余，辄从事著述。后来仅存《张瑞贵政治主张及所取方略》一稿以及诗词、电稿、家书等，其它著述均已遗失。

先父多次入滇，先后七、八载，完全为了继续革命。一九二七年唐继尧死后，先父决心离滇，虽经龙云主席再三挽留，仍于一九二八年毅然北上至上海。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北伐军节节胜利，但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实行清党，背叛革命。另一方面蒋介石定都南京后，继续沿津浦线向山东进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庇护北洋军阀，悍然出兵，由青岛直驱济南，山东人民在日军铁蹄下，尽受蹂躏，并惨杀了交涉员蔡公时，日久不得解决，造成了一九二八年的“五卅惨案。”

先父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到达上海，当时在沪的辛亥革命老同志如章太炎、唐绍仪、白逾恒等组织了大同盟。认为蒋介石与袁世凯同为窃国大盗，非打倒不可。于是先父参加了大同盟。

先是大同盟派先父到山东观察形势。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蒋

政府，并给其文津员。先父便以地方知名人士出面，强烈要求日军撤退，使山东人民免受涂炭。不料蒋介石认为先父到山东进行政治活动是别有阴谋，便下令通缉。先父却坦然由济南经过泰安（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南京回上海。

返沪后，大同盟组织又进一步密商倒蒋计划。时余年已十八岁，正在高中读书，稍谙事理，犹忆这个正义的反蒋组织，每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同孚路同孚里十号开会。约定各位同志回本省，各密谋组织三个师的兵力。成熟后，沿用辛亥革命形式，由总机关通电发动，各省响应，从而推倒蒋介石。

计划定后，先父积极付诸实施，首先再度返回山东烟台，既机密又稳重地进行策反工作。经过数月努力，实力已经掌握，不料事机泄露，被蒋介石侦知，指使刽子手刘珍年，相机诱杀先父。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这是我家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本是国民党的国庆节，白天刘珍年邀请先父参加阅兵仪式，晚上惟恐先父外出，假意请先父草拟日寇退兵后的治安计划。夜十二时，遂指使特务携带凶器，潜入东海道署（先父临时住所），为了避免声响，用刀斧将先父杀害，为了避免人民反响，并移尸灭迹，为状甚惨。

先父随员高梦琴、李亚仙以及仆从等人，当日因外出游览，闻讯后星夜逃往青岛，得以幸免。次日各报，即将烟台事件全部发表。先父故旧友好均以先父正在中年有为时期遽遭不幸，实为国家之莫大损失。此时，余在上海，闻报后，白逾恒老伯教我直接电询烟台。认为如果复电借故推托，便是事实。次日得到复电：“报传子虚，请勿轻信，令尊已离烟台去”。余急由沪返济。不敢上告祖父与母亲。姐弟数人暗自痛哭流涕，共下不共戴天、此仇必报之决心。

烟台事件发生后，大同盟重要成员均皆流亡日本。

（本文作者张济成，系杭州市民革付主任）

张瑞萱先生轶事

赵铭泉 遗稿

张瑞萱，系寿张县台前公社曹岭村人。山东省立第一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第一届国会议员，曾任云南司法司长，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十余年，历尽艰险，毫不畏怯。满清政府被推翻后，顽固军阀张勋，还盘踞在兖州车站，与人民为敌死不投降，妄图助满清王朝复辟。张瑞萱甘冒矢石不怕牺牲，前往说降。当时，顽固军队安排好了明晃晃的刺刀，令其从刺刀下经过，他昂昂而然，毫不畏怯。虽未得到具体答复（被安然护送而出），但其革命精神可见一斑。

铮铮铁骨王明双

赵铭泉 遗稿

王明双，系寿张城东南澄那里（该村已被黄河水冲在黄河之内）人。满清政府将近倒台时，王与师义三等人在南方组织了“铁血团”（“铁血救国”的意思），由南京运来手枪、炸弹十余箱，卸在济南商埠某洋行内，准备起来暴动。此事被济南东关巡防营侦知，派兵围剿，当时王持枪击毙两名巡防兵，因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王当场被捕。送往牢狱后，受了许多刑罚威逼其承认是土匪，并将其右腿用刺刀穿透，穿上猪毛绳子，用拉锯的形式来回抽动，王咬定牙关至死不屈。并斥骂爪牙们说：“老爷们是革命的，你们才是土匪哩！”当严刑方止时，王让爪牙们将他自己的毛衣脱下来换烟吸。爪牙们说：“有烟吸，请吸吧。”王说：“你们这些狗杂种，净是压榨人民的钱，买的烟不能吸。”王又伸出左腿令爪牙们再穿拉左腿，这些爪牙们不敢再动刑。无法审问了，就把王送到巡抚衙门，后又转到高等法院，每

转送一处。王都是大骂一场，终于均未敢收留，黑暗政府就暗暗地将其释放了。

王被释放后，就到医院治疗疮伤，腿肚子无肉仅仅剩下筋骨。包扎完毕，立即乘车南下去了（这以后人们就称他王腐子）。当时到了南京找到了同盟会军队，当了三十九混成旅参谋长兼鲁军炸弹敢死队总长，身披两条职带，回到济南，终于赶走了满清政权。

（本文抄自《政协寿张县委员会案卷64年3号》，标题系本刊编者所加。）

刘登久先生简历

刘遵伦

刘登久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七月，卒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享年六十九岁。出身于台前县刘庙村一个中农家庭。少时入寿张农桑学堂读书四年，毕业回家务农。

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进寿张西街东华号酱菜店学徒十四年，后转玉堂号当雇工。十七、八年的艰苦生活中，他曾多次联合其他雇工反对店主压迫。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他辞工回家务农，国民党政府欲借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委任他为乡长，他坚决拒绝。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日寇攻占县城，他积极参加革命，为地下党的交通员，长期密秘传递革命文件和信息，护送和掩护了许多党的重要干部。

土改时，他主动献出四十亩土地，并担任了十四个村的土改委员会主任，当选为县人民代表。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任县书店会计。

一九四九年，当选县各届代表常务委员，经常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意见，在群众中威望很高。

一九五六年任县卫生院院长，一九五七年当选寿张县副县长（为我县唯一的党外民主副县长）。一九五九年，当选政协副主席，直至一九六四年寿阳两县合并后，仍任阳谷县副县长、政协副主席。一九六四年当选山东省政协委员，连选连任，直至寿终。

抗日战争回忆录

赵西祥 遗稿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侵占寿张后，国民党特务分子也相继混入城内。我地下党组织在上级的领导下，与日伪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内，积极展开了艰苦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县城解放。在这五年中，我们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冲破了一道道难关。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我们的远大理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因时间已经过了三、四十年，有些事项记不清楚，现仅就回忆起来的部分情况，以“一次决策性的会议”、“三个领导核心的决斗”等十五个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写出，供参考。

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一九三九年八月，我抗日政权在黄河南建立后，县委决定从黄河北地下党员中调出一批骨干，充实加强政权机构。

工委调整充实后，面临着日寇大兵压境，伪军土匪四出骚乱，群众恐慌万状；部分党员迁居农村，联系中断，“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情况。如何组织敌区党员，深入发动群众，勇敢地点燃起抗日烈火，打开敌区抗日运动的新局面，将是对工委领导同志的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此，我们在寿张东关一个党员家里，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研究了在这新的形势下，每个党员应以何种职业为掩护，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明确了中心任务是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通

~8~

过口头、传单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战场的胜利消息，揭露敌伪的残暴罪行，以激发和提高敌占区群众的抗日信心。确定了陈永嘉、曹华亭等同志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其他同志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必要时再伺机打入。分别安排到城内及附近农村做党的秘密工作。会后，除工委几个主要成员外，其他同志均变为单线联系。通过这次会议，使广大党员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为在敌占区开展地下斗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为向敌伪军政机关全面进攻吹响了进军号。

三个领导核心的决斗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侵占寿张后，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敌伪军四出骚扰，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日寇为了实现其长期统治寿张的目的，先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组织了“维持会”，为其催收给养，以维持其生命。后成立了伪“寿张县公署”，由伪山东省长唐仰杜派李兴明任县知事。下设秘书、司法、财政、教育、建设、宣传等科，以及金库、看守所、警察所、新民会等机构。还组成了伪山东警备队、县保安队，在日本顾问的监督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始实行对敌占区人民的血腥统治。

同年八月一日，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黄河南建立。杨朴民同志任县长，下设司法、财政、教育、建设等科。全县辖八个区。军事方面，有独立营，各区区队。在中共寿张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广大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

同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又派吴寿祺到寿张任县长。因寿张县城已被日寇占领，黄河南岸又有我抗日政权，他只有在西影唐村秘密召集了一批土豪劣绅、兵痞，宣誓就职。因此村距城太近，不好隐蔽，又拉到西园乡何庄（现属侯庙公社）一带，在袁寿山的武装保护下进行

秘密活动。打着抗日的招牌，实现其反共的目的。不几个月，即撤到西南，被消灭在清丰县仙庄一带。

这样，当时寿张境内，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三个政权。一是爱国的；一是反共的；一是卖国的。就这三个不同性质的领导核心，分别指挥着敌占区各个领域的斗争。

寿张县城是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却是日伪统治的大本营。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除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外，斗争的焦点必须集中到县城。这一点，不仅我党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意识到了。因此，在我地下党组织派人打入伪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分子也混入了城内。我地下党员都采取交朋友的方式，进行革命活动。以姜鸣谦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组织，也布置其党羽混入伪组织，配合日寇汉奸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又派周冠生来寿张，组织保甲指导部。发展武装，派特务姚传斌给伪大队长沈迪生带来委任状，借以掌握伪保安队。他们还派人打入教育界，发展三青团和复兴社，并动员敌占区青年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他们利用群众中的“正统”观念，在伪机关中组织“曲线救国会”。我地下党组织则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方面在伪机关和伪军队中发展抗日同情关系。在当时，我党的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再加上一部分群众的“正统”观念，所以，开展活动是比较吃力的。但有利条件是：广大群众都有一腔爱国心，不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他们又不断听到我八路军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卖国政策。他们在两条路线的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了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慢慢地有些人由倾向国民党反动派，逐渐转向我们一边。这就为我地下党在敌占区开展活动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敌伪军警宪人员经

常侦察我们的行动，想法捉捕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又采取“借刀杀人”和“三统”教化的办法来围攻我们。所以，斗争是艰苦的、复杂的。但我们地下党组织在不断研究新形势，采取新策略的情况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直至坚持到县城解放。

保甲制度与“良民证”

伪政权建立后，他们为了严格控制敌区群众活动，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法。即一人与共产党有联系，本甲内其他户也犯“连坐”罪。为了推行这一制度，凡敌占区群众不分男女，人人必须领取“良民证”。证上贴像片，注明籍贯、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并按指印。要经常带在身边，以备检查。特别是出入县城，更要严格检查。这样以来，使我抗日军政人员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除在我抗日根据地可以白日活动外，到游击区活动就很危险，深入敌区更是困难。

为了打破敌人这一阴谋，便利我敌工干部活动，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给我敌工干部从伪警察所内弄出假“良民证”。上面既有像片，也有钢印及伪警察所专章。看着没有漏洞，而实际上姓名、住址都是假的。这样，我们敌工干部可以在敌区自由出入。只要不带枪支、文件，进城也无危险。当时，李健民同志不断进城活动，杨率民同志也经常出入县城附近。敌工部长李哲同志也曾在我地下党员陪同下，到前三里村陈永嘉同志郊里去过。这样，敌人认为控制十分严格的措施，实际上只能控制一般群众，控制不住我敌工干部和地下党员。另外，通过我们的工作，“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组织人员日益增多。伪区长、伪乡长，大部分掩护过我们的干部。每逢敌人大举扫荡时，我们的干部都分散隐蔽到敌占区。伪一区区长王凤山曾掩护过张秋抗

日县长杨洁民，伪影唐乡长马绪方曾掩护过我敌工干部戴德。大地主、士绅孫如清也掩护过我敌工部长李哲，并为其完成蒐集情报的任务。这样以来，敌人的保甲制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新民”、“曲线”与交心

伪政权的思想核心是新民主义，名曰“新民”实则复古，在思想上倒退到封建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建设王道乐土”等，大力宣传卖国投降主义。他们通过“宣传班”，“新民会”，进行投降卖国，歌颂日寇的奴化宣传，借以迷惑群众，瓦解群众的抗日决心与信心。

国民党反动派则利用群众中的“正统观念”，大力宣传“八路军破枪、土炮打不胜仗”、“日本鬼子也撑不长”，“八路军成不了旗号”，“到后来还是‘老中央’（指国民党）的天下”等等，迷惑群众，争取群众。他们还在伪军政机关中组织发展“曲线救国会”。提出只要心向国民党，听国民党的话，现在披汉奸皮也不要紧，鬼子一投降，摇身一变就是“国军”。他们还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动员一批青年到国民党大后方去，阻止他们走革命道路。

针对敌伪顽的阴谋诡计，我们则大力宣传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在国外宣传中苏英法民主阵营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阵营的好消息；在国内则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伪军的战绩，揭露日寇实行“以华治华”、“三光政策”的残酷暴行，以激发群众的爱国心，和坚决抗日信心，并通过交朋友的方式，亲串亲，邻串邻，心交心的办法，教育伪人员，争取伪人员，使他们由真心向敌，变为真心向我。不少人听了八路军抗战胜利消息，见到了我们的宣传品以及伪报上登载的

国民党将领连续投敌的消息，“正统观念”也逐渐淡薄，意识到国民党靠不住。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所以，群众去掉了“恐日病”，增强了抗日决心。

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斗争

日伪政权为了投靠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中大力宣传其卖国政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也大力灌输卖国投降的思想毒素。在“新民课本”中，宣扬奴化教育。什么“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反共防共”等。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并歌颂曾国藩、李鸿章、吴三桂等卖国投降派。还大讲“共产党不爱同胞、不爱乡邻，不讲人情。”而标榜他们“重人情”、“忠君”、“爱国”、“孝悌忠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卖国奴化教育。

国民党反动派混入伪教育界的人员，则在课本以外再加上些反共的文章，以迷惑青年。他们混入伪机关的人员，还登台演剧，大唱《四郎探母》，歌颂卖国投降派。我们则通过关系让剧团演《汤怀自刎》，歌颂民族英雄岳飞。

为了与他们进行斗争，我们指派地下工作者打入学校。在伪教材之外，有计划地补讲鲁迅的文章及岳飞抗金的故事。秘密宣传抗日，揭露伪顽的卖国投降主义。教育学生热爱祖国，使一些青少年学生迷途知返。

“委任状”与“抗日同情证”

伪寿张县保安大队长沈迪生投敌后，开始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他曾派人与我抗日政府写过信，表白自己当汉奸是为生活所迫，后来要待机反正，求得我抗日政府的谅解。所以，在日寇侵占寿张的初期，

沈迪生还是动摇的。对敌占区群众的迫害，还没有达到十分残忍的程度。自国民党派遣特务姚传斌给其带来“委任状”（国民党委其当团长）后，沈迪生的态度就变了。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靠山，认为自己虽披着汉奸皮，实际上已成了国民党军官了。自此以后，他的反共思想日益增长。出发扫荡的次数也多了，手段也较前毒辣了。以姚传斌为首的特务分子，通过沈大鼻子将手伸向各个伪中队，企图将这些伪军秘密地变成所谓“国军”。

针对这一情况，我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研究。确定国民党反动派抓上层，我们抓中、下层的策略。积极在中、小队长，班长、士兵中发展抗日同情关系。通过亲友同学等关系去发展。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并发给他们“抗日同情证”。持此证者，出城如被俘，可享受我抗日军政机关的优待。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促进了抗日同情者的发展。从伪县公署、警察所到县中队都有了我们的抗日同情关系。这样，使伪军头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也为一九四四年我们顺利解放县城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经济上的控制与反控制

日伪为了消灭我抗日根据地，除军事上进攻、政治上分化外，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严禁煤油、食盐、火柴、棉花、药品以及油墨、蜡纸等用品流入我抗日根据地，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我抗日军民。在敌占区他们则实行“配给制”。煤油、火柴、食盐按户口每月到新民会去领，群众意见很大。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禁运品出城，扼杀我抗日军民。

为了支持我抗日根据地，我们通过抗日同情者和假心向敌者从伪乡保长那里，搞出部分煤油、火柴、食盐及油墨、蜡纸等，秘密运进